

从北魏孝文帝改革看拓跋鲜卑的文化变迁

岳雪莲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许多少数民族内迁,民族迁徙频繁,使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增多,许多民族在与其他民族交往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的产生了文化变迁现象。其中,北魏孝文帝改革促进拓跋鲜卑的文化变迁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本文着重从魏孝文帝改革的措施以及影响等方面来探讨拓跋鲜卑的文化变迁现象。

关键词: 鲜卑;文化变迁;改革

一、文化变迁的界定

著名的人类学家林耀华是这样定义文化变迁,所谓“文化变迁”,就是指或由于民族社会内部的发展,或由于不同民族间的互相影响而引起的一个民族文化系统从内容到结构、模式、风格的变化。^①由此定义可以看出,文化变迁的产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内部原因,即由于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的文化变迁;另一个是外部的原因,即由于与其他民族接触、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影响而引起的文化变迁。本文所论述的拓跋鲜卑的文化变迁就是主要由外部原因所引起的,即鲜卑拓跋部在长期的南迁过程中,与汉文化接触,由统治者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积极接受汉文化,从而实现自身民族的文化变迁。

二、北魏孝文帝改革背景分析:促成文化变迁的客观原因

北魏是由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鲜卑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由鲜卑拓跋部的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拓跋鲜卑是一个远远落后于中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游牧民族,其祖先最初生活在大兴安岭北部,从事游牧射猎,还处于原始部落状态。在其进入中原以前,长期生息于“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②;直到道武帝拓跋珪进入中原后才实行“离散诸部、分土定居”、“给耕牛、计口授田”的农业经济政策,处于前封建社会时期。

拓跋鲜卑在进入中原以后,环境和形势都发生了变化,在经济上,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在政治上,封建统治的一整套制度已达到相当完备的程度;在思想文化上,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封建文化虽然遭受过冲击,但仍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着更大的影响。所有这些,显然都与拓跋鲜卑原先所处的塞北截然不同了。但是拓跋鲜卑的统治者并没有立即意识到这种变化,北魏政权建立之初,依然坚持原有的习俗和传统,实行落后而残暴的统治方式,结果是加剧与其它民族特别是中原汉族的民族差异,激起了北方各族人民的不满和反抗。

当时,北魏政权内部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非常激烈。北魏北部边境地区民族经济成份还占很大比重,不少相继归附拓跋魏的部族,仍保持着血缘群体组织,过着游牧生活,在

农业和畜牧业中,仍大量役使奴隶劳动。直至太武帝末年,大规模战争基本结束,社会经济渐渐恢复,奴隶来源枯竭而日趋消亡,封建农业比重越来越大,并逐渐居于支配地位,改变了北魏初期农牧并存的现象,这时拓跋部的封建化步伐才比过去更快。不过,北魏社会经济封建化的过程并未完成,直到孝文帝改革前,北魏国家仍然是几种经济制度的揉合体。但封建的经济制度已占主导地位,它不可能和落后的经济制度平等相处,它们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这一斗争体现为北魏前期复杂而紧张的阶级矛盾,又由于北魏统治者是落后的拓跋部上层集团,他们有极深的民族偏见,以征服者的姿态压迫和剥削其他各族人民,对各族人民的统治带有强烈的民族压迫的色彩,甚至是疯狂的屠杀百姓,因而又存在着尖锐的民族矛盾,阶级和民族这两大矛盾交织成北魏统治的复杂形式。严峻的现实,迫使北魏统治者不得不在以下两种前途中做出选择:要么继续顽固地坚持原有的传统不变,在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斗争中走向灭亡;要么适应中原地区的环境和条件,扬弃崇武的旧传统,“偃武修文”,致力于建立一种既与中原的先进汉文化相适应,又与拓跋鲜卑本身的社会发展相一致的新的统治模式,达到北魏统治的长治久安。在这样一种统治压力和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北魏政权为了自身的统治与发展只有采取汉化的道路了。

孝文帝亲政时,北魏王朝在政治上、文化上还存在“胡汉杂糅”的不协调现象,而且鲜卑落后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也未改变,与逐步封建化了的社会经济不相适应。因此,孝文帝在冯太后实行封建化改革已取得良好效果的基础上,又实行了以鲜卑汉化为中心内容的一系列改革。

三、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进行:文化变迁的历程

公元471年,孝文帝拓跋宏继位,北魏历史已经经历约一百年了。孝文帝即位之初,北魏的阶级矛盾尤其是民族矛盾已十分突出,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纠缠在一起,危及北魏政权的继续统治。“到魏孝文帝时,汉民的反抗规模愈益扩大,有政治才能的魏孝文帝采取各种措施,暂时缓和了这个危机。”^③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魏孝文帝改革,也称太和改革(“太和”是孝文

帝的年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北魏孝文帝改革鲜卑族生活方式的政策应该说是为满足鲜卑族自身发展及其作为统治民族的需要而采取的一种促成文化变迁的措施。

北魏孝文帝改革前夕,北方各民族,包括鲜卑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尽管也已出现了民族融合的趋势,但各民族基本上保持了本民族的特征,因此还是独立完整的民族。魏孝文帝的改革,是采用法律手段,依靠国家政权,强制地使鲜卑民族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的特征与汉民族的民族特征相融合,促进鲜卑族的文化变迁,使鲜卑文化极力向汉文化靠拢,这可以从改革的内容上看起来:

首先,迁都洛阳。北魏政权的都城原在山西平城,即现在的大同,那里当时是鲜卑族的政治中心,也是北方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公元494年,孝文帝主动率领贵族、文武百官及鲜卑兵20万,把都城由平城迁往汉民族集中的洛阳,这一举措有利于鲜卑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同汉民族之间的交流,促进了鲜卑族接受汉文化,加快了其文化变迁的进程。

其次,实行均田制。孝文帝下令继续实行均田制,促进了北魏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一经济制度促进了北魏封建化的进程,并为鲜卑族的文化变迁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第三,学说汉话。孝文帝下令,禁说鲜卑语,要求鲜卑贵族学说汉话。语言是交流的工具,语言的沟通推动了共同文化的出现,共同的语言有助于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增强族之间的往来与交流。基于此,孝文帝规定:“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已上,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罢官,所宜深戒”。^[4]“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5]用强制手段把汉语作为全国统一使用的语言推到台前,满足了民族之间交流的需要,有利于加速北魏封建化和北方民族的融合。

最后,改穿汉服,采用汉姓,与汉族通婚。改穿汉式服装也成为鲜卑族由塞外生活转入内地生活的必然举措。孝文帝下令“革衣服之制”。^[6]采用中原的传统服饰,详细规定了官吏的朝服和妇女服饰的具体样式。另外,还提倡鲜卑贵族改用汉姓以及与汉族土族通婚等等。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增进民族之间的认同感,消除彼此的隔阂感。

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目的在于使鲜卑民族同汉族一样,具有同一种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逐渐接受汉文化,与汉族相融合。

事实上,鲜卑拓跋部在长期的南迁过程中,就已经在逐步接受汉文化,在宗教信仰、婚姻丧葬习俗、发式服饰、生活习惯、政治礼仪等方面与汉族日益趋同。以宗教信仰的汉化为例——拓跋鲜卑最初信奉萨满教,后来在接受佛教的同时,鲜卑贵族逐渐摒弃萨满教,清除萨满教的影响。此后,鲜卑人除在政治生活的某些方面还遗留一些萨满教的痕迹外,佛教则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而拓跋鲜卑信仰的佛教,与汉族信仰的佛教在经义、仪式、造像等方面基本相同。这说明,在宗教信仰上,鲜卑与汉族已基本趋同。

孝文帝推行改革鲜卑族生活方式政策的直接目标是要用儒家的礼治与孝治思想来完成鲜卑族的文化变迁,继而确立北魏政权的正统地位。深谙儒家文化的孝文帝了解中原士大夫的心理,懂得他们衡量某一王朝正统与否的标准在于文化和道德,在于大一统和儒家道统,而非种族、血统以及皇帝的

族属与政体。因此,其改革政策行之有因、有据,其目的就是要获取汉族士大夫的认同、巩固其政权,继而完成一统中国的任务。孝文帝主要从改变生活方式、加强族际婚姻与规定葬礼和葬地、修订官制律令、推广儒家教育等方面来实现鲜卑族的文化变迁。

其中,婚丧习俗方面,孝文帝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来达到鲜卑与汉族的彼此接受与认同。早在迁都洛阳前孝文帝就曾下诏明令禁止同姓婚配。^[7]迁都后,大力推行族际婚姻,借此来增强鲜卑与汉族之间的联系,促进鲜卑人生活方式的改变,继而博得汉人的支持与效忠,孝文帝自身“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义、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联,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8]并且他还为其五个弟弟分别指婚迎娶陇西李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等高门之女,并宣布“前者所纳,可为妾媵”。^[9]另外他还要求“于时王国舍人,应取八族及清修之门”。^[10]由上可以看出,孝文帝对鲜卑与汉联姻极为重视,其中当然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如结交高门来推动鲜卑贵族的世族化、门阀化的进程,笼络汉族高姓支持等,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把鲜卑与汉联姻作为增进两个民族之间的了解、扩大相互交流的一种手段,使鲜卑族的文化取向逐渐趋同于汉族,达到族际文化共享的目的。族际通婚扩大了民族间的社会交往,使鲜卑与汉两个民族的成员在许多方面如语言文字风俗经济政治等方面达到一致或高度的和谐,反过来民族间一致性与和谐度的增加又会促使族际通婚现象的大量增多,此时族际通婚成了民族间交流的结果。“通婚是(民族间)社会组织方面融合的不可避免的伴生物”。^[11]据施光明先生研究,北朝正史记载的男女双方均有姓名可考的民族通婚现象共241起,其中与汉族的婚姻有158起,占族际婚总数的65.6%,仅北魏一朝的民族通婚就有121起,若再加上史书上未记载的民间族际婚,可知族际婚在北朝十分普遍,其中又以鲜卑与汉联姻占绝大多数。^[12]错综复杂的婚姻关系网把鲜卑与汉两个民族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广泛的交往、共同的生活方式无疑又会巩固民族之间的联系。“夷夏有别”、“胡汉不同”的观念在两个民族人们的头脑中被逐渐淡化。

另外,推行儒家教育也是推进鲜卑族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手段或方式。在封建社会,儒学是各民族文化共享的思想基础和礼仪范式,也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强大的整合力量,对鲜卑与汉民族文化一体化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孝文帝兴办各级学校,大力推广儒家教育,这是促使鲜卑族接受儒家意识形态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只有通过儒家教育,才能从整体上持续提高鲜卑族自身的文化发展水平,使之趋同于汉文化,从心理上认可汉文化。

但是,鲜卑族对待汉文化并非“全盘接纳”,对某些不适于北魏统治或者落后的文化因素也进行了“拒斥”。比如修订官制律令过程中就做了一些必要的选择和摒弃。由此可见,鲜卑族对汉文化也并非盲目接受,他们基本上是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吸收汉文化继而实现自身的变迁。

综观孝文帝所采取的各项改革措施,诸如迁都洛阳、禁鲜卑服、断北语、改姓名、革礼仪等等,无不体现了他革除旧传统的决心,无不贯穿着“去故崇新”的基本原则。这些措施或多或少

(下转第80页)

们的要求和变化。财务管理环境涉及范围很广,包括经济环境、法律环境、市场环境、社会文化环境、资源环境等因素。这些因素存在于企业之外,但对企业财务管理产生重大的影响。宏观环境的不利变化必然给企业带来财务风险。目前,我国许多企业建立的财务管理系统由于在机构设置、管理人员素质、财务管理规章制度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从而导致企业财务管理系统缺乏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和应变能力,由此产生财务风险。

(二) 企业财务活动本身的复杂性

企业财务活动的复杂性是我国企业产生财务风险的重要内部原因。企业的财务活动涉及的问题很多,遍布于企业活动的全过程,比如企业筹资中的自有资金与借款的比例以及相关的负债经营问题,企业投资中的多元化投资问题,企业利润分配中的比例问题,企业日常资产管理中的存货管理以及应收账款管理等一系列的问题。而且,伴随着近年来企业资产规模日益扩大,发展速度的加快,大多数企业的财务活动变得越来越复杂。

(三) 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对财务风险认识的滞后性

企业作为一个财务主体必然面临财务风险,财务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但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有许多财务管理人员风险意识淡薄,不能从根本上把握风险的本质,认为只要管好用好资金,就不会产生财务风险。财务管理人员的财务风险概念狭隘,缺乏正确地市场风险意识,这也是财务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 财务管理可控范围的局限性

财务管理过程中存在大量的主观判断,财务管理依据的信息也是不完全的。企业进行财务预测、决策和控制所依据的

会计报表、财务分析、经营分析、市场分析等信息都只可能尽量接近真实情况而不可能完全反映事实,管理依据的不可靠决定了财务风险存在。企业在财务管理中常常会遇到不同财务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的情况,这时决策人员就要判断哪个方法更科学,哪个方案更可行,大量的判断也决定了财务风险的存在。

(五) 导致财务风险的其他原因

财务活动通常与相关人员的经济利益直接相关。如果缺少适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相关人员的道德风险和行为风险无法避免,从而也容易导致财务风险的发生。

加入 WTO 后,我国企业跨国经营活动更加频繁和复杂。企业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在财务活动中涉及多币种、大量的外汇结算业务,增加外汇交易和折算风险,加大汇率风险。同时,国家对金融市场的监督也将进一步规范。无论什么性质的企业在金融市场上都将处于公平地位,只能凭借良好的经济效益、看好的市场前景与持续高速的效益增长获得资金,而且企业筹资时还受到各种保护条约条款的限制,这无疑会加大企业的筹资成本,必然导致筹资风险的提高。“入世”之后,产业结构将会出现调整。国内优势企业和国外跨国公司为抢占中国市场以获取竞争优势,资本的争夺战将日趋白热化。企业在并购其他企业的同时又要防止被反并购,增加了资本营运的风险。企业日常资金的周转运作管理风险将会加大。

参考文献:

- [1] 吴少平, 李小燕. 谈财务危机预警分析指标的确定标准[J]. 金融科学.
- [2] 顾晓安. 企业财务预警系统的构建[J]. 财经论丛.

(上接第 111 页)

少地超出了鲜卑传统的规范,反映了拓跋宏已在相当程度上意识到拓跋鲜卑旧习俗、旧传统的不合时宜和不利于统治,因而坚定地采取行动以革除旧传统。因此,北魏孝文帝改革促进了拓跋鲜卑的汉化,促使鲜卑族的文化发生了变迁。

注释:

- ① 林耀华. 民族学通论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2003 年 8 月
- ② 《魏书》卷 1 《序纪》
- ③ 范文澜. 中国通史简编[M] 第二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49. 464.
- ④ 北史·文成五王献文六王[M]
- ⑤ 魏书·高祖孝文帝宏[M]
- ⑥ 司马光. 资治通鉴·齐纪[M]
- ⑦ 马戎, 周星. 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⑧ 施光明. 北朝民族通婚研究[J]. 民族研究, 1993, (4)

参考文献:

- [1] 汤夺先. 北魏孝文帝改革鲜卑族生活方式[J]. 民族教育研究, 2002.
- [2] 常倩. 北魏学校教育对鲜卑族的汉化[J].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 [3] 刘登峰. 从民族学的角度看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作用[J]. 内蒙古教育学院学报, 1998.
- [4] 李吉和. 古代少数民族迁徙与文化变迁[J].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 [5] 王万盈. 拓跋鲜卑在汉化过程中的文化转变[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
- [6] 赵野春. 鲜卑汉化——论北魏孝文帝改革对民族关系的调整[J]. 西北民族研究, 2003.
- [7]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M]. 成都: 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 [8] 王仲荦. 魏晋南北朝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